

# 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理论思考

邬沧萍 谢楠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摘要]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而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特殊性在于中国的加速老龄化是自觉的历史选择。对中国人口老龄化有诸多隐忧无可厚非, 但中国应对老龄化也存在后发优势。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平均寿命的延长使得中国可以克服应对老龄化的悲观思维。为此, 我们需要更新发展观念, 重新认识老年人价值, 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 制定应对老龄化的战略。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积极应对老龄化; 健康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054 (2011) 01-0004-05

## 一、中国的加速老龄化是自觉的历史选择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任何国家都概莫能外, 差别只是出现的早晚和进程的快慢。当今最不发达的地区在本世纪中期也将出现 60 岁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 10% 的格局。人口老龄化在 19 世纪中期最先出现在发达地区, 这是该地区生产力发展, 公共卫生事业进步, 死亡率、出生率相继下降, 实现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在新中国成立后, 死亡率率先下降, 生育率并未随之相应下降, 形成一个庞大的人口转变增长 (Transitional growth),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形成两个人口高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中国失去了及时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有利时机。

在 1978 年改革开放后, 中国面临着两个人口高峰叠加起来的三亿多生育旺盛妇女 (见图 1), 人口再生产潜力非常巨大。中共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 汲取专家、学者和群众的意见, 做出果敢的严格控制人口的决策, 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

在提出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时, 人们已经预见到了人口老龄化会加速和提前实现, 但当时中国人

口多、底子薄, 特别是农村人口多、耕地少、缺淡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这与加速经济发展,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矛盾十分突出。如果人口规模继续盲目增长, 后果将是非常严峻的。这些已经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在当时,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与加速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两难抉择的问题。中共中央权衡利弊得失, 把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这是我国的自觉选择。改革开放 30 年后, 中国的经济奇迹得益于 30 年累计少生了 4 亿人口这个“人口奇迹”。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sup>[1]</sup>

## 二、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有诸多隐忧无可厚非

人口老龄化就是老年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愈来愈高, 这就意味着老年人口规模大、增长快并且日趋高龄化, 同时劳动年龄人口、青少年人口相对减少。人类社会在 20 世纪中期才开始认识人口老龄化, 当时生产力还不够高, 科学技术还不发达, 人口学、社会学、生命科学、老年学知识积累相对不足。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 学者普遍对人口老龄化有各种隐忧, 担心诸如劳动力不足、劳动力老化、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者学习能力低、劳动力转岗难、劳动力难以适应新

[收稿日期] 2010-10-07

[作者简介] 邬沧萍 (1922 -), 男, 广东番禺人,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楠 (1985 -), 男, 江西吉安人,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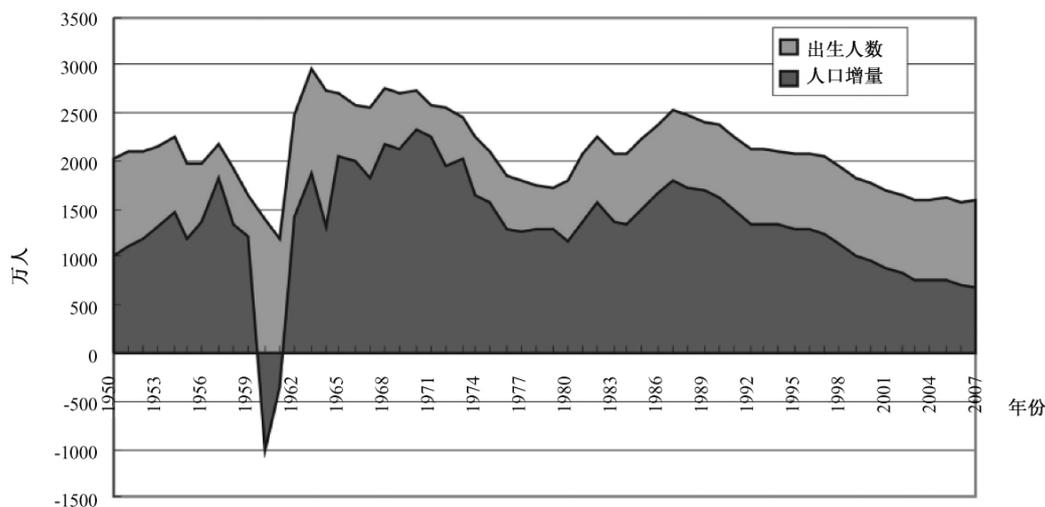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量变化情况（1950~2007年）

资料来源：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司，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人口和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2007）[M].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8年。

技术和新的管理模式等问题。有的学者则担心由于人口结构老龄化，老年抚养比愈来愈高，将导致社会储蓄率低、社会积累低、扩大再生产投资缩减。另一方面，有的学者担心随着老年人口快速增加，社会保险将难以为继，社会保障、老年福利开支持续膨胀危及国家财政，等等。更多人则担心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平均支出是人口的5~6倍，特别是高龄人口需要长期护理时，医药费用支出和照料、护理、康复等更是国家、社会、家庭的沉重负担等。可见，早期出现的对人口老龄化前景“居安思危”的悲观情绪并不是空穴来风。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日趋发达，悲观的情绪才开始逐步扭转。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许多学者提出“成功老龄化”、“有保障的老龄化”、“生产型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直到2002年提出“积极老龄化”等。这表明在人类长寿时代，人口老龄化并不像以前“谈虎色变”，但隐忧远未根绝。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总人口和老年人口都占世界的五分之一。由于长期积贫积弱，在改革开放前我国GDP还不到世界的1%。中国人口庞大，并且又迎来加速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sup>[2]</sup>许多国内外有识之士都对中国人人口老龄化前景忧心忡忡，不少西方学者甚至断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将必然受到人口老龄化

拖累，甚至被拖垮。

必须承认，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挑战是严峻的，需要认真对待，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首先要做好思想、理论和舆论的准备，物质准备，各种方针、政策、立法、制度的准备，开展全民和老年人健身、保健和医疗卫生的准备。我国绝大多数老年人生活消费起点低，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保障能实现低水平、广覆盖、可持续，这为我国应对老龄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存在后发优势。当下我们处于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的年代，有可能吸取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教训和最新研究成果，扬长避短。

### 三、与时俱进、更新观念，满怀信心地应对人口老龄化

人类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始于20世纪中叶，“国际老年学学会”于1950年成立，人口学第一本人口老龄化学术著作——《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后果》出版于1956年。当时人类社会生产率、人均收入及劳动生产率普遍不高。那时人类的平均寿命开始提高，但最发达的国家除了欧洲几个小国外，平均寿命不足七十岁。据联合国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在20世纪50年代，整个世界平均预期寿命为46.6岁；发达国家的平均

预期寿命为66.1岁,欠发达国家为41.1岁,中国为40.7岁,最不发达国家为36.1岁,而高于70岁的国家只有三个。人们普遍担心养老资源不足,担心老年人的晚年收入不足和各种慢性疾病,诸如癌症、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将困扰老年人,特别是担心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长期照料的问题(LTC)。部分发达国家在人口老龄化早期,一度大量建设高成本的养老机构来应对人口老龄化,但未达到预期目的而不得不改弦更张。各种不利局面都使得人们对人口老龄化忧心忡忡。近三四十年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地区的经济突飞猛进,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全球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长寿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和世界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对自身生命发展的认识也大大推进了一步,并共同规划和制定千年发展目标。人们认识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死亡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人口必然进一步老龄化。按照今天的老龄化标准,21世纪中期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3和1/4是很普遍的,发展中国家也会占到1/5左右。但人类绝不会因老龄化自我毁灭,而必然寻找对策以实现持续发展,因此人类对人口老龄化没有悲观的理由。而克服对人口老龄化的悲观思维必须提高科学认识水平,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首先更新几个观念。

1. 更新发展的观念。养老资源不一定是老龄化的最大隐忧。养老资源,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发展。传统观念认为生产发展主要立足于劳动力数量。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手工业生产甚至是机器生产时代都需要大批体力劳动者。按照传统观念,人类必然担心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不足、劳动生产率低、老年人无学习能力、不易转岗、不能适应新技术需要等问题。然而在后工业化时代、信息科学和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劳动者身体素质普遍提高,文化教育科学水平和技能迅速提升,人力资本大大增加,工作年龄能够大大延长。尤其在中国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远不如劳动素质低、劳动参与率低、劳动力结构不优化等问题突出,何况我国劳动力数量尚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2. 更新对老年人健康的观念。传统观念都认为“逢老必衰、逢老必病”。在老龄化出现

时,传染病死亡率已大大降低,但老年慢性病的防治还不多,对许多慢性病都束手无策,平均寿命并不高。老年人健康普遍欠佳,随着年龄的增长常常伴随着有一两种慢性病。但今天人类的健康水平普遍提高,生命科学已是当代发展最快的科学。许多研究已经证明,老年人存活到75~80岁甚至更高岁数时,依旧可以保持很高的健康水平、自理能力和社会功能。因此对个体衰老的观念要不断更新,逐步消除产生悲观情绪的思想根源。

另外,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将产生新的“人口红利”。一般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深度发展,老年抚养比不断提高并拉高社会总抚养比,使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在2030年前后关闭,届时“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我们认为随着老年人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的逐渐提高有可能产生新的“人口红利”,这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老年人的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速度将逐渐减缓,老年人劳动生产率将在一个较高水平上保持更长时间,这就能相对延长人们从事劳动生产的时间,进而使整个社会负担相对下降;其次,随着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升,老年人的独立性增加,疾病残障率下降,被照料的时间缩短,将节省大量的医疗开支和照料成本;最后,老年人退出正式劳动力市场后,可以继续参与社区工作和家庭照料,继续为社会为社区为家庭做出贡献。

3. 更新养老观念。在现代社会,养老资源最少包括经济供养、健康维护、生活照护和心理慰藉四个方面。农业社会传统的养子防老、家庭养老观念需要更新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更新不是完全被取代,子女和家庭成员仍负有相应的责任。必须强调的是,有的责任是无法推卸的。对于我国传统的孝道,必须继承但也要观念更新,赋予其时代精神。<sup>[3]</sup>在当代,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养老对老年人负有很大的责任,但也不可能全面取代家庭养老。养老责任不能全部推给政府,但要由政府主导、组织全社会参与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来承担愈来愈多的责任。这个养老服务体系是社会化的,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含慈善公益组织)、志愿者、社区等,共同承担责任。老年人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在养老方面仍然负有责任,特别是在提高自养能力、生活自理

能力和照料护理等方面。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要长期打造，不能一蹴而就。

4. 更新对老年人社会价值的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老年人退休、离开工作岗位常常被视为无多大社会价值，甚至成为社会的负担，这是人口老龄化产生悲观思维的重要根源。在当今长寿时代，大多数人退休后仍能存活 20~25 年。在“终身福利、终身健康、终身学习、终身参与”的时代，老年人积累的人力资本、技能和经验对社会、国家、社区、家庭仍有很大价值，如维护社会稳定，对青少年教育、生产发展、社会福利的参与等，是社会建设的宝贵财富。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积极应对老龄化”理论是对“积极老龄化”理论的本土化发展。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是从某种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总结提炼而成，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任何社会环境，因此需要将其自身特征与具体的社会环境相结合。“积极老龄化”理论强调个体应不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务，强调尽可能地保持老年人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强调从生命全程的角度关注个体的健康状况，使个体进入老年期后还能尽量长时间地保持健康和生活自理。从这个意义上说，“积极老龄化”理论着眼于个人，体现出一种个人主义本位。而中国有着自身独特的国情：长期的社群主义传统和家庭养老传统，使得中国老年人的独立性不强；深远的“大国家、小社会”传统和较短时间的市场经济发展，使得中国社会力量相对弱小，可利用的社会资源较少；中国社会转型的滞后与中产阶级成长的滞后使得个人为责任主体的养老方式短时间难以建立，这使得助老服务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因此“积极应对老龄化”理论强调老年人个人、家庭、社区、企业、社会组织、政府各个主体的共同参与，体现出一种集体主义本位。

#### 四、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础工程

健康老龄化是老年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新思维，它是应对个体老龄化的一项战略思维。它认为衰老是人生理发展的自然过程。衰老有自然衰老和病理衰老之别，二者常常混杂在一

起。正常衰老不仅可以延缓，还可以大大推迟和压缩，甚至是可以逆转的。病理性衰老加速衰老过程，也是可以避免或减轻的。健康老龄化经大量衰老科学研究证实，人在 75~80 岁甚至 85 岁以后一切功能仍能基本上和以前一样，关键是保持科学的生活方式，远离病理性衰老。个体衰老是人们担心劳动力短缺、劳动生产率低、退休年龄提前、自理能力低、医疗费用高昂等人口老龄化隐忧的自然生物根源。如果一个老龄化社会大多数人能延缓衰老，其在客观上就如今天一个中年人的增龄过程，身体机能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实现健康老龄化是一个艰巨长期的科学和社会工程，是可望也可及的。<sup>[4]</sup>

积极老龄化是在 2002 年的马德里国际老龄大会上提出的，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新思维。它是健康老龄化在理论上的完善和必要条件。积极老龄化把健康、保障和参与看成三位一体，强调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必要性、重要性。<sup>[5]</sup>积极老龄化能充实老年人“六个老有”和强化我国老年人最缺的“归属感”，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发挥老年人的潜能，增加社会人力资本，为社会造就一批为老服务的志愿者队伍，是应对老龄化所不可或缺的。

#### 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 2006 年中共中央在统筹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积极老龄化的理论升华，由应对个体老龄化上升为应对群体老龄化，着眼于宏观层次<sup>[6]</sup>。两者有联系又有区别。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直接目标是社会持续发展、社会和谐，使老年人生活和生命质量提高；而积极老龄化的直接目的就是老年人的健康、有保障和参与，也就是老年人生活、生命质量的提高。二者可以说既殊途同归，又相辅相成。

如果没有宏观层面的各项社会政策、机制和制度，如社会保障、国家财政的投入、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老年人活动的基础设施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保障，就不可能有老年人的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更谈不上成功的老龄化。如果没有中青年、老年人个体的积极参与，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是无法实现的，生产型的老

龄化与和谐的老龄化则更是难以实现。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核心在于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似乎只与老年人有关，其实它涉及每个个体，因为“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与各年龄人群都有关，它涉及到每个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包括每个人的学习、保健、工作和退休。应对当前老龄化的投入和各项举措、制度安排最大的受惠者是下一代的老年人，即当代的年轻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动员全社会参与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要有积极乐观的心态。首先，对老龄化积极乐观是科学认识、唯物史观的产物，而非盲目乐观。只有摒弃各种悲观思维，才能满怀信心地积极应对。其次，全社会要全力以赴、积极主动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社区、志愿者、老年人及其家庭各有责任，共同应对才能有效和持之以恒。最后，科学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把各项应对举措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健全各项机制，力求方法、措施到位，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养老的道路。

注释：

- [1] 邬沧萍，谢楠. 合理控制人口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J]. 同舟共进，2009 (4).
- [2]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R]. 2006.
- [3] 邬沧萍. 批判继承中华传统孝文化并赋予时代精神加以弘扬 [A]. 中国老年学学会. 中华孝文化专辑 [C]. 北京：五洲文明出版社，2004.
- [4] 邬沧萍，姜向群. “健康老龄化”战略刍议 [J]. 中国社会科学，1996 (5).
- [5] 世界卫生组织著，中国老龄协会译. 积极老龄化理论框架 [M].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3.
- [6] 邬沧萍，王萍. 积极应对老龄化 [J]. 求是，2009 (6).

##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in China

WU Cang-pin XIE Na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udies Center of RUC,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is an inevitabl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however in China it is a conscious historical choice about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aging.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there are many hidden worries about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in China, however it is obvious that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China to cope with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China can overcome the pessimistic thinking on coping with aging becaus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extension of human life. So we'd better update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revalue the value of the elderly and mobilize the whole society by a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aging.

**Key words:**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active response to the aging; healthy aging